

略论戴震的语言学思想

陈健儿

戴震，字东原。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戴氏学术成果遍及哲学、历史、语言、天文、地理诸多方面。戴氏的治学方法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①。这是以文字学为基点的治学方法。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三个方面。在这三方面，戴氏都有所建树。这些建树分别体现在他的语言学论著《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转语二十章·序》、《答段若膺论韵》中^②（以下分别简称《论小学书》、《序》、《论韵》）。

一、六书有体用之分

戴震在《论小学书》中，给六书的性质下的定义为：

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谱，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书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

戴震跳出了两千年来一直为学者所固守的“六书为造字之本”的藩篱，分六书成四体二用，六书的性质为之一变。

戴震把指事、象形、会意、形声立为造字之法；转注、假借立为用字之法的思想基础，他在《论小学书》中也有表述。他认为，形声字和假借字从文字的形式上讲是一致的，都重声不重形，但产生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他说：“六书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这就把形声字和假借字本质上的区别显示出来了。转注是用字之法的结论，则是通过对文字实例的分析得出的。他说：“《说文》：‘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考，从老省，丐声。’其解字体，一会意，一谐声，甚明。而引之于《序》，（指《说文解字·序》）以实其所论转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别有说也。……震谓考老两字属谐声、会意者，字之体，引之言转注者，字之用。”戴震认为，许慎在说解中分别将考、老定为形声字、会意字，而在序中却又把考、老都用为转注的代表字。这并不是许慎

自相矛盾，这正说明，许慎也认为转注和形声、会意的性质是不同的。

戴震将转注、假借从六书中分出来的指导思想，已如上述。那末，他的这种思想是否有渊源呢？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对六书的研究则起于两汉。考查古籍所载，大致可以把两汉时期对六书的研究成果归纳成三个流派：

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郑众注《周礼·保氏》：“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许慎《说文解字·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汉人对六书的解释，大别之，不过上述三家。其中，班固之说已把六书定为造字之本。郑众之说，虽没有明言六书的性质，但是，他把转注与假借杂入象形等四者之间，也就等于把六书的性质统一起来了。班、郑之说基本上已确定了六书是造字之本的性质。后起的许慎之说，对六书各下了缜密的定义，但是，许说并没有提及六书的性质，这就使后人在研究六书时，只能囿于六书是造字之本的说法。

从两汉到清乾隆的近两千年中，解释六书的不下数百家，各家对六书性质的看法则如出一辙。持异见者宛如大海仓粟。然而，正是这些大海仓粟构成了戴震的四体二用说的源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明朝学者赵古则、杨慎的观点。^③

赵古则说：“转注者，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义而转者；有但转其声而无意义者；有再转为声用者；有三转为四声用者，至于八九转者亦有之，其转之法则与造谐声相类。”赵氏很明确地提出了转注是“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者。”这里，他突出了一个用字。虽然，赵氏也认为“其转之法则与造谐声相类。”但是，转注与形声，一言用，一言造，赵氏还是在性质上把它们加以区分了。

赵古则仅对转注的性质提出了异义，杨慎则更进一步把假借也分了出来。他说：“六书当分六体，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假借、转注是也。六书以十分计之，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转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四象之书有限，假借、转注无穷也。”杨氏以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已占尽了造字的鳌头，假借、转注就只能借此四者，注此四者。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与假借、转注经纬分明，这就隐示出了六书中假借、转注与其他四者本质上的区别。

可惜的是，赵杨两氏对六书性质的论定，前者失之于偏而不全，后者失之于优柔寡断。杨慎虽已领悟了六书中指事、象形、会意，形声与转注、假借本质上的不同，但他还是将班固之说导乎前，不敢论断。戴震则以此为源，畅所欲言。

戴震的体用之分说产生后，研究《说文解字》的方法为之一变。清朝研究《说文解字》的段玉裁、朱骏声、王筠，他们的学术成就都产生于戴氏创立四体二用说之后。分析他们的有关论著，可以证明，段、朱、王在研究《说文》时，都是恪守戴震的四体二用说的。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于此矣；字各有声，音尽于此矣。有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④段氏借文字的外壳（音、形）与内涵（义）的错综关系来区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与转注、假借之间本质上的不同。无怪乎，段玉裁曾言：“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⑤这说明，段氏的六书理论是本之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的。

再看朱骏声的巨著《说文通训定声》，本书的编排体系是：以声为经，以形为纬。将《说文》九千余字按十八个韵部分成十八卷。每字于本义外，又列转注、假借义（部分字下还列有别义）。朱氏在该书后叙中称：“《说文解字》形书也，《说文定声》声书也。《说文解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书也，《说文通训》转注、假借之书也。”可见，朱氏此书解释字义是以转注、假借义为主的。他采用这种独特的体例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他在自叙中云：“天地间有形而后有声，有形声而后有意与事。四者，文字之体也。意之所道，而转注起焉；声之所比，而假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毋庸置疑，这种思想也是本之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的。

王筠的《文字蒙求》仅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卷，王氏以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二者为纬，用字之法也。”^⑥有了这个原则，在编字书时，转注、假借就被王筠弃置不顾了。

六书的体用之分说异军突起，当然会在学术界引起非议。戴震的新颖论点立足于对转注与假借解释的基础上。他在解释转注时，把转注的范畴盲目扩大，他说：“《尔雅·释诂》有多至四十字共一义，其六书之法欤？别俗异言，转注而可知，故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这就让反对体用之分说的学者抓到了话柄。正如清学者孙雄在《六书皆造字之本，非有四体二用可分说》^⑦中指出：戴、段之误在于不知转注之义。批评戴氏四体二用说最尖锐的清学者陈澧，在《书江良庭徵君六书说后》^⑧一文中，就是从批评戴氏转注说入手，进而批驳六书有体用之分。对六书有体用之分说的异议，同段、朱、王以此理论为基础，在研究《说文》上取得的成就相比较，虽然是不足道的，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戴震的六书理论是有罅缺的。

二、由音转探求汉语语源（附：戴震拟定的上古音母系统）

戴震在《序》中说：“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学士茫然莫究。今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戴氏设想利用语气声气的自然节限，对“其用至博”的汉语词汇归纳分类，以求语源。

戴震在《序》中立正转、变转之法。他说：“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又云：“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可以比之而通。”这样，他就确立了一个由音转求语源的原则。

戴氏所谓的同位、位同都是对声母而言。他说：“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这里，声之大限就是等韵家所谓的五音：喉牙齿舌唇五类；戴震又分每类各成小限四位。这样，五类总共二十位，每位自成一章，全书二十章。同类的四个位称同位，如喉音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中的所属字称同位字；五类中每类

相对应的一个位称位同，如喉音的第三位、舌音的第三位、牙音的第三位、齿音的第三位、唇音的第三位，这五个位中的所属字称位同字。戴氏以为，对汉字这样分类后，就可探求它们的音义关系了。

据戴震在《序》中所列喉舌牙齿（唇音字未列）第三位字分析，我们对戴氏拟定的上古声母系统，能够有一个初步认识。分析的方法是，把例字在《广韵》中的反切上字查出，然后，把这些反切上字对照陈澧《切语上字分并三十六类考》^⑩中所列的《广韵》反切上字，可得到下面的结果。

第三章：台，与之；余，以诸；予，余吕，阳，与章。反切上字与、以、余皆属喻母。

第七章：乃，奴亥；奈，乃带；那，诺阿。反切上字奴、乃、诺皆属泥母。

第十一章：尔，儿氏；女，尼昌；而，如之；戎，如融；若，而灼；如，人诸；然，如延。反切上字儿、尼、如、面、人。除尼外，皆曰母。

第十五章：吾，五乎；印，五刚；言，语轩；我，五可。反切上字五、语，皆属疑母。值得注意的是，喻泥日疑四母均属次浊音。可以断定，在戴氏拟定的声母系统中，每类的第三法是次浊音。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戴震定拟的上古声母系统的轮廓：依不同的发音部位，分声母为五大类；每类又按不同的发音方法分成四位。整个声母系统成五类二十位。

《转语二十章》，戴震仅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中，他简单地表述了他的声母分类思想。通过这仅几百言的序，我们还无法了解戴氏声母分类的全貌。在此三十年后，戴震完成了声韵巨著《声类表》，《声类表》亦分声母为五类二十位，分析此书每类的第三位字，可以得到与上述相同的结果。这就证明了，《声类表》中的声母系统应该与《转语二十章》的声母系统是一致的。

附页一

章	类 (大限)	位 (小限)	发音方法	声母 (代表字)	归 词
1 2 3 4	喉	一 二 三 四	清 次清 次清 浊清	见 溪 喻 匣	台 余 予 阳
5 6 7 8	舌	一 二 三 四	清 次清 次清 浊清	端 透 泥 来	乃 奈 那
9 10 11 12	牙	一 二 三 四	清 次清 次清 浊清	照 穿 日 禅	尔 女 而 戎 若 然 如
13 14 15 16	齿	一 二 三 四	清 次清 次清 浊清	精 清 疑 心	吾 印 言 我
17 18 19 20	唇	一 二 三 四	清 次清 次清 浊	邦 滂 明 奉	

分析《声类表》声母系统的结果表明，戴震的声母系统与传统的三十六字母不同。他将齿

音的照组定为牙音，又将牙音见溪群归入喉音。由于传统的齿音精、照二组没有次浊音，戴氏又把牙音疑母归入精组，半齿音日母归入照组，戴震进而将半舌音来母归入舌音。这样，他就取消了半齿音与半舌音，并七音成五音。在五音的排次上，戴氏序为喉舌牙齿唇，与传统的唇舌齿牙喉不同。在发音的方法上，戴氏也变传统的清、次清、浊、次浊为清、次清、次浊、浊。据此，我们可以把戴氏所拟的声母系统归纳成上表，这个表也就是他设想中《转语二十章》的编排体系。（表见附页一）

三十六字母是一个比较符合《广韵》反切上字的中古声母系统。戴震却在归纳了《广韵》反切上字后，得出了一个与中古声母系统出入很大的声母系统。可见，他的声母系统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戴震的声母分类思想是以他心目中的音理为基础的。

《转语二十章》是想通过对每个汉字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异同的分析归纳，来达到探求语源的目的。这里，戴震犯了一个错误，他忽视了韵母的作用比声母更大，拼合一个汉字，可以没有声母（零声母字），但是，决不能没有韵母。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戴震要想完成《转语二十章》，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序》中，戴震毕竟提出了通过音转探求汉语语源的设想，这就使训诂学跳出了传统的固守前人经籍传注的范围，为后人研究汉语训诂开辟了新的途径。

附 页 二

类	收音	部次	部目	性	韵目	类	收音	部次	部目	性	韵目
一	喉	1 2 3	阿 乌 歪	阳 阴 入	歌戈麻 鱼虞模 铎	五	鼻	13 14 15	嬰 娃 歪	阳 阴 入	庚耕清青 支佳 陌麦锡昔
二	鼻	4 5 6	膺 噫 亿	阳 阴 入	蒸登 之哈 职德	六	舌 齿	16 17 18	殷 衣 乙	阳 阴 入	真淳臻文殷魂痕 脂微齐皆灰 质术栻物迄没
三	鼻	7 8 9	翁 讴 屋	阳 阴 入	东冬钟江 尤喉幽 屋沃烛觉	七	舌 齿	19 20 21	安 霫 遏	阳 阴 入	元寒桓删山仙 祭泰夫废 月遏末黠屑
四	鼻	10 11 12	央 天 约	阳 阴 入	阳唐 萧宵肴 药	八	唇	22 23	音 邑	阳 阴 入	侵盐添 缉
						九	唇	24 25	醮 醮	阳 阴 入	覃谈咸衔严凡 合盍叶帖业洽狎乏

三、阴阳入三分互配的古韵系统

根据《论韵》所述，可把戴震的古韵系统列成上表。（见附页二）

疏理上表可知，戴氏古韵分部的最大特色是，它是一个整齐的阴阳入互配系统。戴氏是汉语史上指出汉语语音系统的第一人。

戴震能够确立阴阳入互配的系统，主要在于他解决了入声韵的分配。他在《论韵》中言：“其前昔无入者，今皆得其入声，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戴氏以为，在他以前，入声的分配一直没有解决，而入声是阴阳两两相配的枢纽。他解决了入声分配问题，也就完成了阴阳入互配的系统。

纵观戴震以前各家的古韵分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入声分配上，戴氏确有独到的见解。戴氏以前的古音学家，顾炎武、江永、段玉裁也把古韵分成阴阳入三类。但是，在入声

韵的分配问题上,他们是各不相同的。顾氏把古入声韵定为四部。但是,他并不使它们独立,而是把它们归入阴声韵中(除缉韵归入阳声侵)。江氏、段氏比顾氏进了一步,他们把入声韵独立了。他们都分入声为八部,然而江、段的古韵分别为十三部、十七部,为了使入声韵与之相配,江、段都主张数韵共一入。江永著有《四声切韵表》,在此书中,江氏已确立了一个以数韵共一入为基础的阴阳入互配系统。

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据《戴东原先生年谱》^①记载,戴氏曾协助江永修订《古韵标准》。无疑,在古韵分部上,戴震要受江氏的音理思想的影响。戴氏的阴阳入互配系统很可能就是渊源于江永的以数韵共一入为基础的阴阳入互配系统。

戴震能够确立一个完整的阴阳入互配系统。关键还在于,他博采了前人之长,特别在入声的分部上,更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入声,顾氏仅分屋质药缉四部。江君析质月锡职而四,析缉益而二,故增多四部。今更析药铎而二。顾氏铎并屋后,而药铎有分。江君适未省照也。”这说明,戴氏的入声九部只是在江氏八部的基础上再加上铎部,而他的药铎分部,也是受了顾氏的启发。

把铎部独立出来,对形成一个完整的阴阳入互配系统有很大的意义。因为,铎部是收舌根音的入声,在《诗经》中,有许多收舌根音的入声字与阴声字押韵。这就使人们形成了在上古收舌根音的入声字与阴声韵是不分的观念。无怪乎戴震要说:“盖江君未知音声相配,故分合犹未当。知皆有入声,而未知歌戈本与旧有入之韵近,因引喉而不激扬,昔人遂以其所定无入之韵例之。凡音声皆起于喉,故有以歌韵为声音之元者,其同于旧有入之韵,不同于旧无入之韵,明矣。江君亦未明于音声相配,此虽仆所独得,而非敢穿凿也。”戴氏从音理出发纠正了前人以歌韵为无入之韵的错误,而以所分铎韵配歌韵。这是他不同于前辈的学术研究方法,戴氏在研究古韵时,并不是单纯地归纳上古语言材料,而是综合了音理上的知识,才得以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阴阳入互配系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戴氏将歌韵定为阳声韵是错误的,这也是他强求整齐所致。

当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年主张古韵阴阳两分,并对戴震的古韵系统颇有微议^②。到了晚年,王力先生放弃了自己早年的主张,也同意阴阳入互配的系统。^③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戴氏的阴阳入互配系统是符合上古汉语的实际音系的。

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即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戴震的研究都有所突破,今天,语言学家都很重视戴震的这些理论。这说明,戴震的语言学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揭示了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

注:

- ① 《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上编卷九。
- ② 三篇论著分别载《戴震集》上编卷三,卷四。
- ③ 赵、杨论述转摘自清人曹仁虎《转注古义考》,文载《说文诂林·六书总论》。
- ④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叙注》
- ⑥ 王说转摘自清人胡韞玉《六书浅说》。见《说文诂林·六书总论》。
- ⑦⑧ 二文均见《说文诂林·六书总论》
- ⑨ 文载陈澧《切韵考》外编卷一。
- ⑩ 章氏成均图见《文始》卷首。
- ⑪ 文载《戴震集》附录三。
- ⑫⑬ 王力《汉语音韵学》第五章,第二十九节,第七章。